

## 第八讲 黑白：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与倒退

莫斯科著名的新圣母公墓里有这样一处奇特的墓碑，几乎使每一位游览至此的来客都驻足思考。墓碑由黑、白两色大理石组合而成，中间摆放的是一个硕大的头像，这就是极具个人风格并为苏联历史留下浓重印迹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墓碑。

赫鲁晓夫，这是一个无法被苏联历史遗忘的人物，尽管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下容不得他孤寂的灵魂。这是一个试图改写“斯大林版”苏联历史的人物，尽管他终究成了斯大林及其主义的守墓人。他前后把持苏联政坛10载，毫不客气地给苏联历史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以粗旷豪放的性格赢得了自己的臣民的爱戴，却遭致知识分子的非议；他以农民式的狡诈周旋于苏联政治风云之中，最后的政治生命却误伤于自己的精明和自信；他为后世留下的最大遗产不是深邃致远的理论，而是改造世界的巨大勇气。赫鲁晓夫的同时代人，著名的苏联和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评论说：“赫鲁晓夫具有20世纪初俄国农民和工人的那种特征。他勇敢无畏，责任心强，但又谨慎小心，有时甚至信心不足。他精力充沛，工作勤勉，坚忍不拔。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他却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精明能干和心地善良弥补了一点，不过他心地善良的一面却被某些吝啬行为、独断专行和对官场普遍敌视抵消了。”赫鲁晓夫的儿子，物理学家谢尔盖·赫鲁晓夫在赫鲁晓夫的葬礼上说过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现在安葬并为他而哭泣的这个人，我们只想说几句话。我不想谈论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我也不想评价我父亲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所作的贡献，我没有权利这样做。但历史将会这样做的。”总之，“赫鲁晓夫版”的苏联历史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常常使历史学家们留连着迷。

在这一讲里我将谈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权力过渡与贝利亚事件。第二个问题：秘密报告及其评价。第三个问题：全面推行改革。第四个问题：不情愿的退休和黯然离世。第五个问题：本讲小结。

### 一、权力过渡与贝利亚事件

1953年3月5日晚21时50分，斯大林病逝。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即当晚20时至20时40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紧急召开了联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组成了新的党中央主席团（也就是政治局），委员由原来的25人减为10人，他们的排序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赫鲁晓夫任命的职务是苏共中央书记，职责是负责党中央日常的组织工作，因为当时没有设立第一书记或总书记，因此赫鲁晓夫实际上处于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地位。这是对党中央领导核心做出的安排。

3月15日召开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以决定新的政府机构管理人选。根据贝利亚的提议，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任内务部长，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长，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长，米高扬为国内和国外贸易部长，萨布罗夫为机器制造工业部长，别尔乌辛为电站和电力工业部长，伏罗希罗夫担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

在斯大林逝世的最初日子里，在苏共中央和政府的领导人的权力分配方面出现了一种平衡状态。几位主要领导人都主张实行集体领导、集体决策的领导方式，并且还以不同方式表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决心。

马林科夫是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非常注意自己的政治形象。马林科夫长期在中央工作，长期在斯大林身边扮演高级幕僚的角色，既缺乏基层工作的实际经验，在党内又缺乏

威信。莫洛托夫曾这样评价马林科夫：“他是一个很好的命令执行人，一个接电话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他总是坐在电话机旁，了解什么地方有什么事情，他擅长此道。按照组织和行政事务来分配干部——这就是马林科夫。……他从来没有领导过一个党组织，这和赫鲁晓夫不同……”

1953年3月10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幅拼凑起来的假照片，题目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马林科夫同志在一起》（1949年12月，马林科夫当时是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二次1957年11月）。马林科夫严厉地批评了负责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苏斯洛夫、波斯别洛夫和《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马林科夫认为：“在我们这里有极不正常的情况，许多事都是按个人崇拜的路线进行的”，他表示：“我们认为，应该停止执行个人崇拜政策”。

5月27日，《共产党人》发表社论，题为《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强调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智慧，党的巨大经验的体现。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的党中央委员会，是由党、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军事活动各个领域中具有渊博知识和领导经验的党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协同一致工作的结果。这些决定是由集体讨论和作出的。”

在新的领导集体中，贝利亚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一系列特殊举动引起赫鲁晓夫的警觉。

贝利亚1899年出生于格鲁吉亚的农民家庭。1917年3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后曾担任格鲁吉亚政治保卫局主席、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等职务。1931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4年起他当选联共（布）中央委员。1938—1945年，他长期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以及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他积极参与和指挥了大清洗活动，包括斯大林去世制造的最后一一起冤案，也就是医生谋杀案。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公布一起惊人的消息：苏联内务部破获了克里姆林宫内的一个阴谋团体，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放射科医生雷吉娅·季马舒克密报，宣称克里姆林宫医院的许多有名医生“妄图通过有害的治疗来缩短苏联积极活动家的生命”，并说他们已杀害了日丹诺夫和政治局委员谢尔巴托夫，并打算谋害华西里耶夫元帅、戈沃罗夫元帅、什捷缅科将军和海军上将列夫琴科等苏联高级将领。季马舒克因此被斯大林亲自授予了列宁勋章。国家安全部门侦查的结果“表明”，这些医生与国际犹太人恐怖组织“犹太联合救济委员会”有联系，专门从事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为美帝国主义服务，随后在苏联掀起一股反犹的波澜。

在斯大林执政期间，贝利亚亲手制造了无数起冤假错案，但在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却首先提出大赦犯人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建议。3月27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大赦令，有约100万人获得自由。4月4日，贝利亚控制的内务部又宣布为“医生谋杀案”的涉案人员平反。

在新的苏共领导集团中，贝利亚的地位仅次于马林科夫而位居第二，同时他通过自己把持的内务部实际控制了莫斯科的行政和警备大权。贝利亚把内务部队的几个师调到莫斯科，名义是“维持秩序”。他极为反常的行为引起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注意，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等人认为贝利亚的目的在于阴谋夺权，准备采取措施。但是他们知道，此事绝不可轻举妄动。因为贝利亚的亲信不仅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主席团成员的办公室里安装上了窃听器，就连马林科夫等领导人的住宅、别墅和私人汽车里也可能有窃听器。

赫鲁晓夫秘密召集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最后决定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主持清除贝利亚的行动。布尔加宁以国防部长的名义把贝利亚的亲信、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捷米耶夫调离莫斯科去斯摩棱斯克组织军事演习。

1953年6月26日晚，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书记的名义打电话通知贝利亚到克里姆林宫开中央主席团会议。贝利亚落座之后问道：“今天的议题是什么？”赫鲁晓夫回答：“只有一个议题，讨论拉甫连季·贝利亚的问题。”然后由马林科夫做了批评贝利亚的讲话，约15分钟后响起了两声长长的铃声，行动小组成员冲进大厅，将贝利亚团团包围。

马林科夫宣布：“贝利亚不仅仅是国内的敌人，也是国际的敌人。建议立即将他逮捕并

交给这几位同志。”贝利亚没有做任何反抗，只是呆呆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神经质地用铅笔在纸上反复涂写“警报”两个字。当晚，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立案侦查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决议。

7月2日至7日，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宣布贝利亚是“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他的反党活动“旨在为了外国资本和利益破坏苏维埃国家和居心险恶地试图将苏联内务部置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之上”，宣布将其开除党籍，解除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将其交由特别法庭审判。

马林科夫在会上做了报告，他强调要从贝利亚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提出四点要求：

第一、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第二、内务部必须处于党的绝对监督之下。

第三、要防止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和野心家。

第四、要加强对全体党员的教育工作。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是马林科夫在全会上点名批评了斯大林，认为“斯大林同志的个人崇拜在日常的领导工作中已具有了病态的形式和规模，工作中的集体领导方法被抛弃了。”

二是赫鲁晓夫作为苏共中央书记自始至终主持了清除贝利亚的行动，并且在全会上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中央里的地位实际上已经从第五位升至第二位。

随后最高苏维埃宣布解散内务部，将其部分职能划归刚刚成立的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总检察院以人民敌人罪宣布判处贝利亚死刑，并于同年12月23日执行。

清除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最高领导层内部第一次激烈的政治斗争，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党的团结。从另一方面看，也是一场权力斗争，因为贝利亚专权和争夺权力已经危及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地位的稳定。

## 二、秘密报告及其评价

1953年9月，赫鲁晓夫再次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赫鲁晓夫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的同时，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却在不断下降。

1954年4月，在一些党员的强烈要求下，苏联最高法院开始审理“列宁格勒案件”。这个案件是由长期在列宁格勒担任领导工作的日丹诺夫于1948年突然去世引发的，被此案牵连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曾担任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党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吉奥诺夫。1950年9月，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宣判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因犯有“叛国罪”被处以死刑。经过认真调查，发现该案件纯属伪造，12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宣布平反。调查结果表明马林科夫直接参与了此案的制造。尽管法庭没有对马林科夫提出指控，但马林科夫与大清洗期间一系列案件的关系暴露出来了，马林科夫的声誉因此而骤降。

1955年1月25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不指名地批评马林科夫：“有些同志在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上糊涂了。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们错误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并把它作了庸俗化的解释”“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只不过是党的诽谤。这是右倾的复活”。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也在发言中批评马林科夫在个人能力和政治素质方面的问题，严厉地批判他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犯下的一系列错误。最后，中央全会同意解除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1955年2月9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马林科夫承认自己“缺乏行政经验”和“对农业生产不善负有责任”。请求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申请书。苏联最高苏维埃接受马林

科夫的辞职请求，降为部长会议副主席，改任命他为苏联电站部部长职务。

1956年2月14日，苏共20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这是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细心的人发现，大会主席台上没有像历次大会一样悬挂斯大林的画像，只有列宁的画像。

赫鲁晓夫作了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点是社会主义已越出了一国的范围，成为一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已无力阻挡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程。两种相对抗的世界经济体系——按照不同的规律和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体系的同时存在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他因此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论点——三和主义，主张实行缓和世界局势的对外政策。

在报告中，赫鲁晓夫重申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得到了全体代表的拥护。全体代表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就在大会宣布闭幕后代表们准备返程时，于2月24日夜11时至25日晨突然被召回，代表们还发现多了100多人，他们是应邀而来的已恢复名誉和获释的党员。

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在扬扬4万余字、历时4个多小时的报告中，赫鲁晓夫点名批评了斯大林，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个人专权、破坏法制、无端大搞政治镇压运动。

赫鲁晓夫强调报告首要目的在于搞清“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理，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他强调：“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多年来，我们养成了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人，具体地说就是这样看待斯大林的。”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到了列宁遗嘱中关于斯大林的评语，“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考虑一下他所犯的全部过失，我们必须相信列宁的担心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滥用职权的地步，因而给我们党造成莫大的损失。”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心胸狭窄、残忍和滥用职权的人。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去动员群众而是常常不仅对真正的敌人而且对那些党和苏联政府毫无罪行的人进行镇压并加以肉体消灭。这里没有一点道理，有的是对于弗·伊·列宁感到震惊的残忍暴力的炫耀。”“斯大林怀有病态猜疑，他是表现上疑心很重的人，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是了解这一点的”“因为怀有病态猜疑心，斯大林即使对那些了解多年的党的优秀活动家也不信任，在他看来简直到处是‘敌人、叛徒、间谍’”。

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重用叶若夫、贝利亚等坏人，批准大规模逮捕、处死大批无辜者，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斯大林这一猜疑心被贝利亚巧妙地加以利用了。这是一个卑鄙的挑衅分子，一个恶毒的敌人，他杀害了数千名共产党员和忠诚的苏联人民”。

赫鲁晓夫甚至认为斯大林应该对基洛夫之死负有重要责任，而且“时至今日，在基洛夫事件中仍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在苏德战争前怀有“失败主义情绪”，应对苏军初期战争的失利负直接责任。因为“据现在发表的文件，丘吉尔在1941年3月通过英国驻苏联大使，直接向斯大林发出警告：德国为了进攻苏联而重新编制军队。……尽管有这各重大的警告，但斯大林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苏联的防卫以免遭到突然袭击”，甚至“在希特勒军队侵入苏联的前夜，一个德国公民越过边境报告说：他们已经接到命令在6月22日凌晨二时发动对苏联

的进攻，这件事马上被告知斯大林，但他对这一警告也加以漠视。”

在此，赫鲁晓夫特别强调：“使伟大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并非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我们英雄的军队——它的天才指挥员和勇敢的士兵，以及全体苏联人民。（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批评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并且认为这是极不人道的行为。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以一些民族与“法西斯合作”为名，对这些民族进行处罚，强行将整个民族迁离故乡，流放到中亚或西伯利亚。报告说：“不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要有一些常识的人，谁也不能设想这种行为，怎么能够说整个民族要为对敌行为负责呢？怎么能够针对整个民族，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内进行镇压呢？怎么能够要他们为个别人或某些组织的敌对行为去遭受苦难呢？”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认为斯大林应对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负有主要责任。“这方面斯大林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南斯拉夫事件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党内同志式的讨论，得到解决。产生这样的事件，是没有重大根据的，完全可以不同这个国家断绝外交关系。”

在报告结尾，赫鲁晓夫提出了肃清个人崇拜的三项措施：第一、在思想领域肃清个人崇拜造成的错误观点的恶劣影响。第二、党政机关要严格遵守党的集体领导的重要原则。第三、必须彻底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赫鲁晓夫这个石破天惊式的报告当时的效果如何？我们可以从现场的代表们的反应中略见一斑。

在苏联的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有着这样的一个惯例，即在随后印发全党的领导人报告中要将当时的会场反应记录下来。于是，在领导人的讲话中会穿插着“掌声”“雷鸣般掌声”“全场起立，雷鸣般掌声”“全场起立，长时间地，雷鸣般掌声”等表示程度不同的会场互动情绪。在已经公布的赫鲁晓夫所做《秘密报告》的记录中，不仅有“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热烈的掌声”“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全场欢呼、起立”，还有“全场群情激动”“会场骚动”“笑声，全场活跃”“笑声、掌声和呼声：‘对’”。表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代表中引起极大的震惊和反响，同时也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

2月25日，苏共20大继续开会，与会代表们一致通过了《苏共20大关于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的决议》，责成党中央继续采取措施保证完全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恢复党的生活准则和集体领导原则。

作为苏联的冷战对手的美国对于苏联国内的一切风吹草动是非常注意的，中央情报局于大会结束当天就了解到了这一报告的一些内容，它立即下令驻莫斯科和东欧的所有情报人员收集这份报告。3月10日，美国驻苏联大使波伦得到了报告的文本，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报告了美国国务院。6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报告部分内容，标题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由此《秘密报告》的名称不胫而走。

如何评价《秘密报告》？

第一，秘密报告对于党内高层并不秘密，但提出的方式对于广大党员有些突然。

在苏共20大筹备过程中，赫鲁晓夫就准备在大会上公开批评斯大林，他认为不公开批评斯大林，苏联的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就无法彻底解决。为此，他命令主管苏共意识形态的波斯别洛夫秘密准备一个报告。但是当报告准备好后，是否公开在全体代表前点出斯大林的名字，并批评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在党内引起激烈争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持反对意见，他们的理由是当时自己也在斯大林身边工作，这样做无异于引火烧身。但是在赫鲁晓夫的坚持下，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由赫鲁晓夫召开大会的内部会议，在会上作《秘密报告》。由中央主席团决定后才由赫鲁晓夫作报告的。多年后，莫洛托夫曾回忆：“关于赫鲁晓夫要在20大上作这样一个报告的事，我们是知道的。报告没有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过，但其主要内容是知道的。”

《秘密报告》最初局限在苏共中央委员和代表的小范围内，而且报告现场严禁记录。会议结束后，报告副本曾送给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如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契尔文科夫、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拉科西、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多列士、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陶里亚蒂、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伊巴露丽和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科普勒尼希等。

但是，《秘密报告》在苏联历史上长期是一个秘而不宣的文件。苏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和全文公布《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是在33年后的《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上。

第二，苏共20大的召开和《秘密报告》是苏联共产党拨乱反正的继续，也是广大干部和群众要求进一步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恢复党、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的政治生活的结果。《秘密报告》公开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有胆识地、及时地打破斯大林的神话和迷信，有利于让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认识斯大林主义的危害，对当时的平反工作和以后苏联政治体制的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评价不全面、不公正。斯大林犯有严重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斯大林的一生来看，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应该确立斯大林应有的历史地位。但赫鲁晓夫一味谴责，把一切错误推到斯大林身上，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这样的评价既不全面也不公正。

第四，把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品质而没有做深入的考察。报告没有深刻分析个人崇拜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更没有从制度层面阐述斯大林问题的要害——高度集权的官僚和独裁体制，而是一味地过分强调斯大林性格粗暴、缺乏耐心、好大喜功等。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期的核心成员之一，积极推行斯大林的路线和政策，斯大林的错误理应有赫鲁晓夫的一份，但赫鲁晓夫把一切错误推给斯大林，完全不作自我批评。而且，赫鲁晓夫坚持抛出《秘密报告》，明显有将其作为在党内权力斗争中战胜对手的手段意图。

《秘密报告》和公开批评斯大林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思想解放，为进一步改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认为赫鲁晓夫是用“平反”来“收买”人心。因此他们联合起来，准备将赫鲁晓夫赶下台。马林科夫更是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对其他表示：“应当采取行动，如果我们不撤了他们，他们就会搞掉我们了”。

1957年6月18日，苏联政府中央主席团特别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一开始，马林科夫就提出中央主席团会议不应由赫鲁晓夫来主持，说这是违反列宁的传统的，应该由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主持。马林科夫的提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赫鲁晓夫只好从大会主席的位子下来，坐在了一边。事后，莫洛托夫曾得意地说：“1957年，赫鲁晓夫被撤职了三天”。

马林科夫等人提出了免去赫鲁晓夫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建议，给赫鲁晓夫三天时间，允许他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名义召开符合法定人数的中央全会，以决定赫鲁晓夫的去留。马林科夫等人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结果他们完全低估了赫鲁晓夫的影响力。赫鲁晓夫命令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动用军用飞机，以最快的速度把住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到6月21日，来到莫斯科的中央委已有80多人，加上主席团的中央委员，总数已达到107人，按照规定召开中央全会的法定人数已经达到。

6月22日下午2时，苏共中央非常全会召开。

在赫鲁晓夫的安排下，朱可夫率先发言，他直截了当地指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期间所扮演的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并且出示了中央档案馆中保存的当年处决“人民敌人”时的判决书，那上面在主席负责人和领导人的审批签名中，除了斯大林、叶若夫、贝利亚外，就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签名。

朱可夫警告马林科夫：“你们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否则我们就向军队和人民呼吁”。朱

可夫的发言及其与马林科夫的交锋，一下子就扭转了大会的导向，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从“原告”变成了“被告”。

与会者有60多人发言激烈地批判马林科夫等人，最后于6月29日通过了《关于反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定》，宣布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走上反对党的领导和派别斗争道路”，宣布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苏共党内的重大斗争，不是像斯大林时代一样，以政治消灭和肉体消灭为结束的。赫鲁晓夫没有将他的对手处死，而只是将他们赶出中央委员会，甚至也没有开除他们出党。在行政职务上，莫洛托夫去职后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大使，卡冈诺维奇的新职务是彼尔姆州索利卡姆斯克的乌拉尔钾矿联合企业总经理，马林科夫的新职务是哈萨克乌斯基卡缅诺戈尔斯克州水电站站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他们新的职务与从前相比当然不值一提，但在经济收入上却还是比较实惠的。

关键时刻搭救了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朱可夫又变成了赫鲁晓夫的心病，他手中拥有军权朱可夫是拿破仑式的人物，谁也不敢保证他不会在苏联搞一个雾月政变。1957年10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接除了朱可夫国防部长职务，任命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为新的国防部长。

至此，斯大林去世后，长达五年的权力过渡期间结束，随着赫鲁晓夫被任命为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已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

### 三、全面推行改革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22大召开，西方媒体称这次大会是“赫鲁晓夫的大会”，因为赫鲁晓夫一人几乎包办了从主持会议、致开幕词、做《政治报告》、做总结报告、致闭幕词等会议所有的仪式。赫鲁晓夫强调本次大会“将作为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代表大会，作为审查和通过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纲领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

新党纲继续坚持苏共20大上的提法，强调资本主义正处于总危机阶段，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必完全通过革命和战争的形式，以民主的、议会式的和其他和平方式的实行社会主义也是目前争取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重要途径。新党纲宣布：“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了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新党纲提出20年内在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计划。

大会闭幕前夕，列宁格勒、莫斯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代表团要求将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搬出列宁墓，建议得到与会绝大多数代表的赞同。大会为此通过一项特别决议：“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权力，对忠诚正真的苏联公民进行广泛镇压，再将斯大林的水晶棺保存在列宁墓里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期的这些和其他许多行为已使得自己的棺木继续存在于列宁墓已不再可能。”

随后，全国掀起了公开批判斯大林的浪潮，全国各地成百上千个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广场、工厂、农庄都重新命名，1925年命名为斯大林格勒的察里津，被改名为伏尔加格勒，伏尔加——顿河运河上的巨大的斯大林青铜纪念碑也被拉倒熔解。

赫鲁晓夫政府推行的政治改革包括：

一、扩大苏维埃权力，提高苏维埃作用和地位。鉴于长期以来以党代政，苏维埃机构职能和地位都极为有限的局面，苏联政府通过一系法令，加强苏维埃立法权以及对执行机关的监督权，扩大地方苏维埃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权力等。

二、提高社会团体的地位和作用。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系统地提出了全民国家的理论，他强调国家某些机关的职能要逐步过渡到社会团体手中，如对居民的文化服务、医

疗卫生、体育运动、保障社会秩序等，都可全部或部分转归各类社会团体。

三、提高群众地位，加强群众监督。赫鲁晓夫主张要相信群众，扩大群众参政范围，让劳动者参加各级监督机关，听取群众意见。

四、实行干部轮换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各级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和专业化。苏共22大党纲明确规定党政组织机关按比例定期更换，中央委员会及主席团每年更换1/4，主席团成员最多任3届。

五、强调党政分工，将党组织分成农业党和工业党。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决定把边疆区和州一级党组织，划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两个独立的系统，并分别成立工业党委会和农业党委会两个独立的领导机关。工会、青年团、妇女组织也相应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套班子。

六、实行集体领导。赫鲁晓夫执政前期，坚持集体领导。1952—1957年苏共中央主席团定期开会，每周至少一次，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主席团集体讨论决定，如有分歧，少数服从多数。在斯大林时期，1923—1929年每年开3次中央全会，1937—1952年每年不到一次。

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改革包括农业和工业建筑业两个方面。

在斯大林去世前几年，苏联农业发展非常缓慢，单位面积产量始终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粮食产量从1913-1953年基本没有提高。赫鲁晓夫素以农业专家自居，他在农业改革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53年9月，赫鲁晓夫在就任苏共第一书记的中央全会上，第一次公开发表的长篇报告就是谈苏联农业问题的。在赫鲁晓夫任职期间，关于农业的演说、报告、备忘录和评论，总共12集，出版了八大卷。1954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报告》。向共青团员们提出了“开垦、开垦、再开垦”的口号。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农业落后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农业生产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二是许多集体农庄取消了副业，破坏了把集体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三是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对技术设备的利用不能令人满意，四是现行的实物报酬制度不能刺激先进的集体农庄。

赫鲁晓夫农业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1、改变农业计划管理体制，使集体农庄有较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并允许集体农庄庄员拥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和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2、全面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取消义务交售制，改行收购制，取消多种价格结构，实行统一收购价格，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3、改变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撤消机器拖拉机站，合并集体农庄，将力量薄弱的农庄变成国营农场。4、大幅度削减自留地的物产税，对个人副业采取有限制的鼓励政策。5、改革劳动报酬制度，贯彻物质鼓励原则，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6、探索基层劳动组织形式，推行小组包工奖励制。7、增加农业投入，大规模垦荒。以上改革基本摆脱了斯大林时期农业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给予农民更多的经济利益，并且调节器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农业生产得开始好转。

1954—1956年，苏联的播种面积增加了29%，1954—1958年粮食每年平均收购量增长37.6%。到1958年为止，农业生产有了根本性的好转。粮食产量1953年为8000万吨，到1956年就上升到为1亿3千万吨。1953年每户农民收入150美元，1958年上升为600美元。1956、1958年农业大丰收，也使赫鲁晓夫名利双收，因此而获得了列宁勋章。

但由于1958年的粮食大丰收，赫鲁晓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提出了苏联在“3—4年内人均肉类、牛奶和黄油产量方面赶上美国”。其实，当时美国人均每年消费肉类约130公斤，苏联只有36公斤，差得还很远。一些地方领导为了讨好赫鲁晓夫，采取虚报、浮夸等办法，助长了浮夸风。有的地区为了完成该计划，一是杀种畜，二是花钱从外地买。加之大规模种植玉米计划、取消休耕地、取消草田轮作制和无节制垦荒等做法严重违背农业生产规律；大量的垦荒使得许多良田变成沙漠，耕地面积不增反减；1958年赫鲁晓夫又要求集体农庄买下全部的国营拖拉机站，尽管这一计划在1959年底就基本完成了，但由此却给苏联

农业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集体农庄为了购买昂贵的机械设备，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许多生产项目，而且不得不向银行大量贷款，造成了许多集体农庄长期负债。这一切使得苏联农业在1963年又困境，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减少了28.6%，改革也终告失败。

工业和建筑业的改革与调整是经济改革的最重要、最有影响和意义深远的组成部分。赫鲁晓夫政府的基本思路是废弃部门管理体制，简政放权给地方，改革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试图运用商品和价值规律。形象地说：改原来自上而下统得过死的中央管理局式的“条条”为根据资源优化组合而设立的经济行政区的“块块”。

撤销和合并全苏汽车工业部、机器制造部、自动化工具部等7个全联盟部；撤销造纸和木材加工工业部、城乡建设部、轻工业部等15个联盟兼共和国部；撤销了相应的各加盟共和国的联盟兼共和国部；保留了航空工业部、国防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造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电站部等6个全联盟部。在全国设105个经济行政区，下设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业和建筑业由国民经济委员会去管理。

1958年以后，改革趋向于发展各经济区内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化，提出了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集约化生产、加速技术改造的任务，具体是：1、发展经济区内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2、建立跨部门的专业化生产单位。3、推行国家标准化和规格化。4、建立生产联合公司。然而，后期改革仍然只是在计划经济基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从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进行的“行政性分权”；它并没有改变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而是把该体制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层次。因而改革不仅未能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且导致许多新的问题，如地区的“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泛滥。加之改革触犯了过多人的利益，再也难以继续下去。105个小经济区又被合并为47个，部分经济权力又被中央收回，例如年度计划恢复由国家计委制订。经济体制几乎又回到了改革前的情况，工业改革至此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9月9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哈尔科夫工业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利别尔曼的文章《计划、利润、奖金》，提出要以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纯经济手段取代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的生产，把奖金直接同企业的利润和赢利联系起来，根据赢利多少来评估企业管理者的业绩和企业的发展前途。《真理报》特意为这篇文章加了编者按，提出“利别尔曼建议提出了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并“具有巨大的意义”。随后，在经济学界和相关经济部门对“利别尔曼的建议”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赫鲁晓夫对利别尔曼建议引发的大讨论表示了支持，他在1962年11月19日的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近来《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对广泛的经济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应该委托计划机关、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仔细地研究这些建议，利用所有有条理的、明智的建议来改进计划工作。”但是，利别尔曼建议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并未来得及实施，10余年后在得以在新经济体制改革中推广。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政府在针对西方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也做了较大的调整，我们将在第十讲中予以评述。

#### 四、不情愿的退休和黯然离世

赫鲁晓夫于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他的父亲和母亲原来都是典型的俄国农民。1908年，举家移居到南方的顿巴斯，这里是俄国最大的煤矿。青年赫鲁晓夫很快成了熟悉工人。他曾自豪地说过，刚到顿巴斯干活时他得到30卢布的金币。只有技艺超群的钳工才能得到这么高的报酬。

农民家庭和工人出身的身份是素来是赫鲁晓夫最为自豪的。赫鲁晓夫在1959年访问美国时，曾结新闻界表示：“们想知道我的身世如何吗？我刚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劳动。在15岁以前，我放过牛，也放过羊，以后就给地方放牛。以后我在德国人开办的工厂里做过工，接着就在属于法国人的矿井里做工，我还比利时人开办的化学工厂里干过活儿，而现在则是

伟大的苏维埃国家的最高领导人。”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也发表了同样的讲话：“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矿井中度过的。如果说高尔基是在人民的大学里学习过的，那么我就是矿井大学里受的教育。这对工人来说也是某种剑桥，是受压迫的俄国人大学。我父亲就是在这里受的教育，我也是如此。”

青年赫鲁晓夫渴望寻找新的东西和精神享受，他看了《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对他影响巨大，他很快就成了当地工人组织的参加者，并且很快地显示出了鼓动和领导才能，成为罢工运动的领导者。十月革命后，赫鲁晓夫担任过组长、班长和矿长等职。后来，他进了顿涅茨克矿业学院学习。

1925年12月，赫鲁晓夫作为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1932年，赫鲁晓夫被任命为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34年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他又被提升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州委第二书记。这一年他年仅39岁。

赫鲁晓夫把莫斯科看是施展自己的才能和热情的阵地。赫鲁晓夫把主要精力入在莫斯科的地铁建设上去了。1935年，莫斯科地铁第一期工程完成，举国上下庆祝这一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赫鲁晓夫本人也因为突出的贡献，被最高苏维埃授予列宁勋章，这是他获得的第一枚勋章。

赫鲁晓夫在矿业学院读书时的同学里就有斯大林的妻子阿里卢娜娃。来到莫斯科之后，拥有能干的业绩和直爽性格的赫鲁晓夫很快就成了斯大林的座上宾和信任者，在斯大林晚年，赫鲁晓夫始终是斯大林“孔策沃别墅”的“常客”。

赫鲁晓夫是以反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赢得干部和群众拥护的。但到了他执政的后期，他也逐渐地欣赏起别人对他的吹捧和歌颂了。赫鲁晓夫被称为是“火箭之父”“红军缔造者”、“工人良师”、“庄员的知心朋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街上树起了巨幅的赫鲁晓夫挥手致意的画像。

1958年前，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坚持集体领导的作风，苏共中央主席团定期开会，每周至少一次，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主席团集体讨论决定。但是当党政大权集中于他一身，赫鲁晓夫就逐渐地听不得不同意见，开始独断专行。赫鲁晓夫大搞任人唯亲，他的女婿阿朱别依仅仅因为拍摄他的照片而获得列宁奖章，并跃升《消息报》主编，最后成为赫鲁晓夫的私人外交特使。

1964年4月17日是赫鲁晓夫的70岁生日，全国各地、各个行业都给他送来贺寿的礼物，从庞大的工业品和农产品模型和宣传画到衬衫、袜子应有尽有，赫鲁晓夫也模仿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特意给这些礼物举办的一个展览会。当时上午1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去赫鲁晓夫家祝贺。他宣读贺信，表示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表示特殊的敬意”，并且说赫鲁晓夫“才渡过了自己一生的一半岁月，希望他起码再活70年”。勃列日涅夫代表党和政府给赫鲁晓夫颁发了第四枚金星勋章。

长此以往，赫鲁晓夫专横的工作作风和改革中的一些严重失误，使党内和社会上对他的不满之声越来越多。从1964年7月开始，以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密谋活动已经在紧张地策划着。

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在米高扬的陪同下离开莫斯科去黑海度假，克里姆林宫几乎天天在开秘密会议。10月13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对赫鲁晓夫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抨击几乎都集中在赫鲁晓夫的工作作风和个人品质上，主要包括：破坏集体领导的原则，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他人，不理睬其他领导人意见，在干部问题上独断专行，不能克制自己，作风粗暴，自我标榜和吹嘘等。

在会上，为赫鲁晓夫说话的只有米高扬一人。米高扬建议解除赫第一书记职务，而保留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遭到反对。众叛亲离。第二天早晨，赫鲁晓夫在事先准备好的退休声明上签了字。

10月14日下午中央全会召开，最后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宣布“鉴于因赫鲁晓夫同志破坏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出现的错误和不正确的行为，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央主席团内形成了十分不正常的局面，妨碍了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去履行领导党和国家的职责”，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满足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党的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请求”。

10月16日出版的《真理报》发表了简短的公报：“苏共中央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从此退出苏联政治舞台，成为苏联人民特殊养老金领取者，每月的养老金为500卢布。他在苦闷寂寞之余，用老式钢丝录音机口述自己的回忆录，经过整理后送到国外出版，因此受到苏联政府的批评，他被迫发表声明，宣布回忆录是假的。

赫鲁晓夫在突然失去了权力之后，大有“虎落平阳”之感。他终日在收拾自己家里的自留地和口述回忆录度日，他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赫鲁晓夫素有“农业专家”之美誉，在位时他频繁地去各地视察，并亲自对农业、工业在技术方面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一点直到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也难以改变，他经常去附近的工厂和农场去散步。而且他最大的乐趣便是房子旁边的果园和菜园。1971年9月13日的《真理报》并未刊登讣告，只在第一版下方用小号字刊登了一则带黑框的消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沉痛宣告，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退休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于1971年9月11日逝世，享年78岁。”

赫鲁晓夫的葬礼在列宁山下、莫斯科河边的新圣母公墓举行。参加葬礼者仅150人，没有苏共中央领导人参加，只有赫鲁晓夫一生的朋友米高扬在最后时刻委托人送来了花圈。当天下着小雨，颇感凄凉。按照惯例，无论是在任还是离任的苏联中央第一书记去世后都将作为列宁的亲密战友埋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列宁墓后的红墙下。而赫鲁晓夫作为犯了严重错误的前苏共领导人，只能易地并且低调下葬。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代表家属发表了谨慎的讲话：“我们想就这个我们正在安葬、我们为之哭泣的人说几句话。老天也和我们一起落泪。我这里不谈作为国务活动家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几天全世界的报刊、电台都在讲这个问题；我也不评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的父亲所作的贡献，我没有这个资格，历史将作出自己的评价。我唯一能说的，就是他没有让他遇到的任何一个人漠然置之：他有朋友，也有敌人。关于他、关于他的业绩的争论将会长期存在，这再次证明：他没有虚度自己的一生。我是把他作为父亲，作为我的父亲、我们全家的父亲来谈论的，我们了解他，他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他活在我们的心中。愿他活在亲人们的心中，活在他无数朋友的心中吧。没有言词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情。我们失去的这个人，完全可以称之为大写的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并不多。”一位个子不高、头发花白的妇女——娜杰日达·季曼施泰因说道：“我从1926年就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一起共事，我们相处得很好。1937年我被捕入狱，直到二十大以后才得到释放和平反。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你为在监狱和劳改营里无辜受害的几百万人恢复了名誉，是你释放了在拘禁地受尽折磨的几十万人，我谨代表他们、代表他们的亲友，向你表示感谢，向你深深地鞠躬。我明白，这需要有多么大的恢复公正的勇气、胆量和愿望。这一点，我们将终生难忘，并且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赫鲁晓夫的葬礼是非官方的，完全是家庭性质的，但是在遗体下葬时，乐队还是演奏了苏联国歌。

## 五：本讲小结

赫鲁晓夫所作《秘密报告》在其执政时期和整个苏联历史上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这一问题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长期关注和争论焦点。

国内学者多从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两个方面来考察赫鲁晓夫坚持做《秘密报告》的原因。

孟迎辉在《政治信仰与苏联剧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中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认为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主要原因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当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权力斗争是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原因之一)。她从斯大林去世后到赫鲁晓夫权力地位巩固这一过程来看,认为“秘密报告”是赫鲁晓夫争夺权力的第一步。赫鲁晓夫首先搞掉了贝利亚,继而用“秘密报告”这张王牌击败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而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权力斗争告一段落,他就缺乏明确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当全国随后掀起对个人崇拜激烈争论的时候赫鲁晓夫却保持沉默。而当他认为反党集团要反攻倒算时,赫鲁晓夫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重新反对个人崇拜。因此,她得出“秘密报告”只是赫鲁晓夫争夺权力的需要而已。

左凤荣在《赫鲁晓夫传》(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中则认为,一方面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的萎靡不振和战争进程中斯大林的一些指挥失误刺激了赫鲁晓夫,另一方面审查贝利亚使赫鲁晓夫洞悉了一些他从不知晓的大清洗内幕,他为此感到震惊,他发现斯大林才是无数冤魂的始作俑者,他感到受骗了被愚弄了。这一案件从一个侧面证实,斯大林滥用其掌握的无限权力经常独自做出重大决定,连政治局委员都不通报,且对红军将领的清洗使苏联卫国战争初期遭受了巨大损失,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另外,左凤荣还认为苏南关系恢复后,赫鲁晓夫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推给贝利亚,遭到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轻蔑和讽刺,令赫鲁晓夫生气也是导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原因之一。

曾枝盛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缘由与后果》(《社会科学论坛》2001 年第 1 期)国除了提到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有争夺最高权力的目的之外,还提到了两点,一是为了制造对赫鲁晓夫自己的个人崇拜,二是为了讨好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做出的一种政治姿态。关于后一点曾枝盛指出,1956 年前后,由于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和苏联氢弹的成功试验,赫鲁晓夫的尾巴翘到天上,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线从此可以消除了,两大阵营可以“和平共处”了,因此,他对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表示“尊重和信任”,为了表示这一点,“秘密报告”就是他献上的一份见面礼。

张捷在《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另有独到见解。首先,斯大林经常在众人面前取笑赫鲁晓夫,甚至糟践他,而赫鲁晓夫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和保住自己的地位总对斯大林的揶揄都忍受着,但心里总是不满的。赫鲁晓夫又是一个没有文化知识、理论素养和道德观念的人,更谈不上有什么思想信念,他性格粗野,有时甚至蛮不讲理。这样的人一旦有了机会,长期积累的怒气必然发泄出来。其次,赫鲁晓夫积极主动地要做“秘密报告”,而且在报告中用很大部分着重讲大清洗运动,显然是为了争取主动,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为自己开脱罪责。张捷还认为赫鲁晓夫在西方影响下接受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思想,他和他的同伙借口反对个人崇拜否定斯大林,是为了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复辟资本主义。

徐隆彬在《赫鲁晓夫执政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中认为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也有他的责任感和正义感的因素。因为关于“秘密报告”的动因,赫鲁晓夫本人曾做过这样的解释:审查委员会揭露出来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使我良心不安,一种为无辜蒙冤者恢复名誉的崇高责任感使我鼓足了勇气”,向中央主席团提出了这个建议。

关于社会原因,学者们的意见较为一致,多数学者都从客观的角度对“秘密报告”进行了肯定。时殷红在《论非斯大林的复杂起因和多重后果》(《史学月刊》1999 年第 4 期)中认为,以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为开始的正式“非斯大林化”运动的起因不能单纯地归因于赫鲁晓夫的政治利益或思想感情,或仅把它当作苏联领导集团内权力斗争的结果来考察,而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动力:首先是斯大林大规模清洗及其人民内部其他大规模镇压或伤害行

动的成千上万受害者（尚存的受害者，包括因亲属被捕被杀而饱受歧视和耻辱的人们），其次是各类明确倾向于要求改变斯大林时代种种错误政策和革除体制弊端的社会群体或人士。在某种比较间接的意义上说，甚至还有苏联大多数普通人民。

此外，左凤荣除了提出赫鲁晓夫挺身而出反对个人迷信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之外，还认为背后存在着苏联高层内部的路线之争，以莫洛托夫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主张沿着斯大林的航线走下去；以赫鲁晓夫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派希望改变斯大林的内外政策走改革之路。赫鲁晓夫要提高自己的威信，为改革扫除障碍，他必然要拿斯大林开刀。

第二个重要学术问题就是如何评价赫鲁晓夫及其改革？因为，在事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在这个问题上，在国内学术界依然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历史人物，我们自然要以历史标准来做出评价，自然要把这个人物放在历史背景之下做出评价，绝对不能神化赫鲁晓夫，也不能丑化，甚至妖魔化赫鲁晓夫。

第一，赫鲁晓夫本人是苏联历史上极具个人特色乃至个人魅力的领导人，在他的身上，优点和缺点同样以极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

赫鲁晓夫出身于无产阶级底层。父亲是农民，自己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给地主家放过牛羊，做过矿工、钳工。苏联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韦杰夫在《赫鲁晓夫政治生涯》一书中说，“权力对赫鲁晓夫来说从来就不是目的本身，他从未失去同人民的联系，并念念不忘普通工人和农民的疾苦”，“今天50岁以上的人都对赫鲁晓夫印象很深，……大多数人是打心眼里喜欢他”。

赫鲁晓夫身上有许多优点，襟怀坦白，能够独立决断，对党忠心耿耿，深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相信资本主义将很快衰落。他“不失为一个十分独特的人，一个天生有才的人，一个具有非凡的政治气质的人。”然而不可否认，缺点也是很多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改革者，赫鲁晓夫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知识修养亦很浅薄，猎奇和别出心裁的即兴发挥更是政治家的大忌。赫鲁晓夫本人完全是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他又被深深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他虽不断地想出一些新点子，力图改变苏联的旧貌，但他没有能从根本的体制上去怀疑和超越斯大林模式，而是利用旧的机制去推行新的改革措施。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模式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家。正如麦德韦杰夫评价的，“赫鲁晓夫也是斯大林的学生和斯大林时代的‘产物’。他亲自说过他是‘斯大林一伙’中的忠实活动家。难怪他也沾染上了斯大林信徒的许多毛病：专横和残忍，他善于在迷宫般的官僚主义权力机关中见风使舵，善于保持沉默，有怀疑也不说，对十分明显的问题视而不见。因此，他的许多改革和创新前后不一，半途而废”。

第二，赫鲁晓夫的时代是一个思变的时代，赫鲁晓夫以自己的努力为这个时代打下深深的个人烙印。赫鲁晓夫最大的时代贡献就在于，他较为清楚和明确地洞察了苏联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体认了苏共和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发展任务，毅然决然地推行大规模和全方位的改革。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阶段，即从长达29年（1924-1953）的战时状态和非常时期向和平时期的过渡。在此关键时期，新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顶住来自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的重重压力，坚决和果断地推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在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和对外政策等方面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对斯大林执政时期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和教条主义理论形成了较大的冲击。

赫鲁晓夫推行的各方面的改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改革，也是对斯大林模式发起的第一次全面的冲击。改革正确和全面地反映了苏联社会的要求，活跃了社会气氛，促进了苏联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破除经济的高度集中的体制方面，赫鲁晓夫

在农业方面取得了的成绩比工业方面大，但工业方面提出的设想却比农业方面的措施更为深刻地触动了斯大林模式。改革在较深的层次上触及了斯大林模式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为以后苏联政府的改革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长期担任赫鲁晓夫英语翻译的苏霍德列夫本月初发表谈话说：“45年前，赫鲁晓夫打破‘铁幕’，到世界帝国主义的心脏美国作正式访问。由此开始了我国领导的出访和外国代表团的来访，共签协议，相互拥抱……总之，他让苏联走向世界。”

第三，赫鲁晓夫与其他人的斗争既是权力斗争，也是路线斗争。

斯大林去世后，很快在苏共高层发生了权力斗争，赫鲁晓夫无疑是最后的胜利者，而且为战胜对手他也采取了一切手段。但是，这个阶段激烈的党内权力斗争，不仅仅是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彼此间的争权夺利和个人之间的矛盾，而且也是改革斯大林模式和反改革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赫鲁晓夫清醒地看到了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克服重重阻力，坚持推行改革，因而顺应了当时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切身要求，因此他自然在一次次党内斗争中获胜。相反，马林科夫等人因循守旧，瞻前顾后，拖延改革，甚至反对改革，最终不仅成为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而且也成了苏联历史发展潮流的对立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尽管有政治和路线斗争，但不再搞“大清洗”之类的严酷斗争和肉体消灭，即使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被解职后，仍然可以担任收入颇丰大使、水电站站长职务。难怪赫鲁晓夫1964年10月14日签署辞职书时表示，“你们今天能罢免我，不要忘记是我建立了这样的宽松体制。”

第四，赫鲁晓夫改革缺少系统性和连续性和计划性，使改革缺乏科学性和全局性。

赫鲁晓夫的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都不高，他的决策和行事往往凭的是他的直觉，有很大的随意性，经常是朝令夕改，使改革缺乏科学性和全局性。他的决策和行事往往凭的是他的直觉。他的许多最初的想法都是以农村的实际情况为依据的，但这些想法只有经过他身边的“笔杆子”才能见诸于世。而他身边所聚集的顾问又大都是些察颜观色之徒，他们并不真的支持赫鲁晓夫的政策，有的甚至事实上是反对他所作的一切的。”

曾经长期在赫鲁晓夫身边工作过的苏联著名政治学家布尔拉茨基《领袖与谋士》中曾经评论：“不幸的是，包围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是这样一些顾问，他们使全许多合理且成熟的革新思想化为乌有，或者代之以很少经过全面衡量、认真检查和深思熟虑的纯组织决定”。

我们应该分期看待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过渡性的人物，他的时代是过渡时期的苏联时代。如果以1961年苏共22大召开为界，将赫鲁晓夫执政的10年划分为前期和后期的话，前期是他政治生活中的闪光时期。此时的赫鲁晓夫基本是一个朝气蓬勃，锐意改革的领导人，这一阶段也是思想解放和展开改革的激动人心的年代。大规模平反昭雪、进行工业和农业改革、调整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关系、调整与美国的关系。这些改革和调整为苏联历史发展所造成的积极影响是长远的和不可估量的。因此可以说，赫鲁晓夫执政的前期，成绩是显著的，也是主要的。这一时期也是以“解冻时代”载入苏联史册的。

在他执政的后期，赫鲁晓夫及其政府则回到了斯大林模式的老路，当权力完全集中于他一人手中后，他越来越专横跋扈，越来越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听不进去任何不同意见，最终并没有逃脱对绝对权力和阿谀奉承的喜爱，甚至当有人在联合国大会上得罪了他之后，他便不顾一起地脱下皮鞋大敲桌子，以示抗议。个人专权、独断专行、个人崇拜和党政不分等历史积习又回到了赫鲁晓夫身上，并且决定了他的政治生命的提前终结。

或许艺术家的评判能够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

赫鲁晓夫葬礼结束后，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找到了雕刻家埃尔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内为他设计了本讲开头提到的奇特墓碑。这位生前曾因艺术风格问题与赫鲁晓夫发生过面红耳赤的激烈争论的涅伊兹维斯特内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这件特殊作品，“其中包含着永恒的矛盾，光明的进步的因素同反对的因素之间的斗争。用现实的、照相式的描绘可怎么表达呢？

那样使我们的思想偏离方向，流于俗套。这里很需要一种抽象的主题思想，以反映画家奔放的见解。在我们的情况下就是在彼此斗争中相互咬合的白与黑。”

可以说，艺术家的艺术评判也就他的道德评判，显然在涅伊兹维斯特内的心目中，赫鲁晓夫是功过参半的人。因此，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赫鲁晓夫既是斯大林模式的掘墓人，但最终还是扮演了守墓人的角色。

### [建议阅读文献]

[苏] 赫鲁晓夫著， 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3卷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苏] 布尔拉茨基著， 赵敏善等译：《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俄]叶梅利亚诺夫著，张俊翔、石国雄译：《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译林出版社 2009年版

[俄] 梅德韦杰夫著， 述愷译：《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俄] 谢·赫鲁晓夫著， 述弢译：《赫鲁晓夫下台内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徐隆彬：《赫鲁晓夫执政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53年3月-1964年10月》，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美]威廉·陶伯曼著，王跃进译：《赫鲁晓夫全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英文版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W.W. Norton & Co.2003.）

*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ев. Два цвета времени: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личного фонда Н.С. Хрущева: в 2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2009.*

Бурлацкий, Ф. М.,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и его советники - красные, черные, белые*, Москва, 2008.

Ванюков, Д.А.,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Москва, 2007.